

价值挖掘与路径选择： 长三角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与利用研究

朱志平 王思明

(1.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2.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长三角地区农业历史悠久,蕴藏着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农业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初显。本研究尝试从长三角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演化角度切入,从“历时性”维度,基于“逻辑—现实”分析,着重描绘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转向与价值构成,深入剖析现实场域中传承利用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的深刻意蕴。研究发现,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传承利用好地区农业文化遗产,要以价值发现为基础,以价值应用为路径,以价值互促为延伸,通过坚持遗产地居民主体地位,催发政府主导责任,深挖特色资源,打造区域联盟,构建文化认同等举措,全面助推乡村振兴,擘画农业文化遗产传承的“长三角”样板。

【关键词】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传承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6-0134-12

Value Discovery and Path Selection: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and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ZHU Zhi-ping WANG Si-ming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2.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as a long agriculture history, and contains rich agri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the multiple values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have begun to appear.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start from the value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the diachronic dimension based on the logic-reality analysis to emphatically describe the value diversion and value composi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deeply analyze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inheriting and utilizing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real field domain.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good inheritance and utilization of regional agri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take value discovery as foundation, value application as path, value mutual promotion as extens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strateg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by adhering to the dominant status of the residents in heritage sites to urge the government take the leading responsibility, deeply dig up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forge regional alliances, build cultural identity and other measures, comprehensively boost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raw a model of the Yangtze

[收稿日期] 2020-1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以来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特色农业发展研究”(21&ZD225)

[作者简介] 朱志平(1989-),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乡村文化、民俗艺术;

王思明(1961-),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River Delta for the inheritance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agricultural heritage; value; inheritance

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时期人类农事活动发明创造、积累传承的,具有历史、科学和人文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综合体系^①。中国当代语境内的农业文化遗产概念,肇始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02年启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项目^②。我国作为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在数千年的斗转星移中不仅形成了悠久的农业文明,更在农业文明社会的长期积累中形成了不计其数的农业文化遗产。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认可的同时,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初显成效。其中长江三角洲区域(文中简称“长三角地区”)农业历史悠久,蕴含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迄今为止,共有27项农业文化遗产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名录,其中4项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名录。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长三角地区在当前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大多地区已实现乡村工业化,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完善,工业经济发展良好。由于受现代技术影响较大,长三角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多样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濒危性特征凸显,大量的农业文化遗产亟待挖掘与保护。2019年12月1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颁布,标志着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③,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进入了全新阶段。在此新形势下,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是否有必要?又该如何用好这个宝贵的财富?学界此前对于长三角地区的研究更多倾向于经济、政策等方面,而近年来农业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更多以文化、农产品贸易、旅游等为主,聚焦长三角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利用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着重描绘了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转向与价值构成,试图说明长三角地区在政策的推动下,不仅可以形成新动能,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还能够唤醒国人对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再认知。同时,研究总结出一条可供借鉴的经验,期冀为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提供“长三角样板”,进而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活化传承与价值永续。

一、价值演化的历史逻辑

长三角地区农业文化源远流长,大约在一万年前,长江流域先民就开始种植水稻。历经数千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认知的变化,农业发展在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高投入高产等阶段后,开始走入多元化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农业文化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下文,笔者拟从历时性维度,着重描述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农业文化遗产所呈现的主要价值变化。

(一)耕耘树艺、小农经济: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的物产自给

长三角地区襟江带海、人杰地灵,农业起源可追溯到万年以前。彼时,农业尚未产生,原始人类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生。中国古代传说中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和伏羲氏“以佃以渔”即是源于原始农业的发展阶段,人类生存依赖于自然恩赐。但受到人口增长和渔猎、采集技术的限制,人类开始面临饥饿的困境,这成为农业起源的动力,并催生了早期的农业生产技术。直至五、六千年前,长江中下游人口持续繁衍,渔猎、采集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生活需要,于是人们开始探索农业种植。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位于今浙江省余姚市)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存^④;在江苏省吴县(今苏州市境内)

① 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变及其学科体系的构建》,《中国农史》2019年第6期。

② 李明、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8-50页。

③ 中共中央国务院:《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9年12月01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19-12/01/content_5457442.htm。

④ 丁金龙:《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水稻田与稻作农业的起源》,《东南文化》2004年第2期。

的草鞋山遗址,发现了百余块水稻田及水沟、蓄水塘等遗迹,是中国发现最早有灌溉系统的古水稻田^①;位于江苏省高邮市龙虬镇的龙虬庄遗址出土了4000多粒7000—5000年前的炭化稻米,经鉴定为人工栽培粳稻;距今5300—4300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西北部瓶窑镇),发现了最早的耕地工具,这些都标志着人们由采集渔猎的原始农业时期开始向传统农业发展时期过渡,也使得长三角地区的人们不再单纯依靠大自然的恩赐,而是在土地上种植粮食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

在夏商周传统农业萌芽时期,根据史料推断,长三角地区的土地制度、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秦汉魏晋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移,长三角地区农田数量急剧增加,围湖造田等活动增加,长三角地区农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农作物品种数量开始提升。及至唐宋时期,随着经济中心向南移动和皇权的重农思想及一系列利农政策,南方水稻种植面积急剧增加,无论是栽培耕作技术亦或是畜牧技术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出现了“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据《旧唐书·食货志下》记载:“此时南方稻米岁运已为300石。”^②由此可见,中唐以来,长三角地区稻米产量大幅提升,农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总体来看,传统农业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并未得到根本转变,土地作物也主要用于自己消费而非商品交换。

(二)阡陌桑田、互利共生: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价值

当原始农业发展阶段的粮食产出无法满足人们的生存生活需要时,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开始充分发挥劳动生产智慧,改良创新耕作工具、提高耕作技术、转变耕作方式,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生产模式逐渐形成。这种集约型农业生产模式因时因地制宜,注重对农时的掌握,《吕氏春秋·审时篇》提出“厚(候)之为宝”^③;《齐民要术》亦引“谚曰:‘虽有智惠,不如趁势;虽有镒基,不如待时。’”^④可见我国古代先民对掌握适宜播种时间的重视。千年来,长三角地区也积累了大量符合田间生产条件和环境特征的农作物,并发展出先进的栽培管理技术。战国以后就出现南方稻作的烤田技术,唐宋以后,长三角地区稻田的耘耨、施肥和灌溉技术都有了显著提升。农民开始利用农家肥来提高单位耕种面积的产量、利用豆类种植进行土壤固氮,实行耕地休闲轮作制,充分有效地利用长三角地区的优质土地资源,这也正是长三角地区“桑基鱼塘”农业生态系统的源起。据载,长三角部分区域内经常洪水泛滥,于是当地人民就将低洼积水处挖成水塘养鱼,挖出的泥土堆成塘基并将桑树种于其上养蚕,形成的蚕沙又可作为鱼的饲料,由此便形成了桑基鱼塘生态系统^⑤。长三角地区凭借其天然的环境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一直以来就是桑基鱼塘系统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种农业生产模式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形成生物系统中的物质能量循环和生物之间共生、养成的规律。当然,“生态”一词起源于近现代,尚是一个“年轻”的理念,但它所涵盖的理念却是传统的,不论是《礼记·月令》所言:“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⑥,抑或是《农说》所曰:“合天时、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功倍矣。”^⑦都体现了古人早期的“生态”理念。在传统乡村空间里,无论农庄还是林地、人类还是动物,都难以单独择出,它们早已联结构成紧密联系、动态平衡的生态整体^⑧,这样的乡村空间也是人们敬畏自然、结合地势、顺应天时而创造出来的千古佳构。

① 丁金龙:《马家浜文化时期水田与稻作农业》,《嘉兴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② 樊志民:《中国农业通史》(第三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0页。

③ 夏纬瑛:《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汇胜之书辑释》,中华书局,1957年,第93页。

④ 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46页。

⑤ 卢勇、余加红:《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农业伦理挖掘与研究——以广西龙脊梯田为例》,《古今农业》2018年第4期。

⑥ 樊志民:《中国农业通史》(第一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4页。

⑦ 宋湛庆:《农说的整理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页。

⑧ 陈加晋、卢勇、李立:《美学发现与价值重塑:农业文化遗产的审美转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三) 经农趋商、物阜民丰：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的经济效益

在长三角特有的农业禀赋条件下,传统农业发展时期,各类农作物和手工作坊就开始走进“市”。在传统的劳作模式中,九月以后,田间劳作会告一段落,人们会利用这段农闲时光进行农具和房屋的修缮,或是利用田间产出进行一些手工业、商业的活动,例如加工食品、纺纱织布、制陶制革等,农民大致在两个范围内进行交易,一为集市,二为城镇。集市与城镇相连,进而形成区域性的商业网络。唐宋时期,人口大量南迁,长三角地区气候温和、水网密布、物产丰饶,水稻被大量种植,南粮北运,长三角地区逐渐成为国家财赋重地,成为我国最重要、最先进的经济区,到宋元时期有“苏常熟,天下足”^①的说法。“市”的发展也盛起于唐、宋,长三角地区涌现出一批著名的“镇”,依托商埠和市集进行农产品及其加工副产物的交易,并保留至今。“民灶千余,阡陌交通”“锦里,蚕市,满街翠珠。”^②“明朝驾幸游蚕市,暗使毡车就苑门。”^③说的便是唐宋时期“市”的热闹景象,这样的景象也标志着人们开始利用田间产物获取经济效益。至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愈发活跃,加之朝廷屡次下诏鼓励农桑,长三角地区生丝贸易日益繁荣,有描述称清代震泽镇“栋宇鳞次,百货俱集。以贸易为事者,往来无虚日。”^④当时商业之繁荣可窥见一斑。

在当代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更是“三农”问题的一部分^⑤。如何传承好、利用好农业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似乎已成为解决“三农”困境的破题之策。各地政府尝试挖掘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并实现价值转换,“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也是各界争相研究的重点,实际上这也是农业文化的经济价值在当代得到利用的一大证明。及至今日,流传千百年蕴藏着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农业生产技术依然为遗产地居民提供着显著而稳定的经济效益。笔者调研发现,长三角地区近年来推动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创新生产方式提高经济效益,延伸农业产品链条,大力发展旅游业,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从而促进地方经济效益显著提升。这也表明进入后工业时代后,农业功能开始向多元方向发展,如出现了观光农业、生态农业等,农业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得以再次凸显^⑥。

(四)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构建

传承千年的中华文脉,吸收了千年来先人遗留的宝贵精神文化财富,积淀了不同地区的优质文化资源,保留了传统种植、手工技艺、民俗、节庆等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粹,数千年来在农业生产中不断传承丰富,最终形成了辉煌的中华农业文明。长三角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内涵丰富,产生了一批文献类、民俗类等农业文化遗产,记录遗产地的生活习惯、生产民俗、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长三角”特征。例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作为中国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不仅传承了稻田养鱼这一古老的生态农业技术,形成了田鱼、稻田、村庄等独特的复合景观,同时也保留“鱼灯舞”“鱼崇拜”等民间习俗。在长三角环太湖地区也有桑蚕生产相关的习俗文化,“洒布种”“祭蚕神”“念佛句”“戴蚕花”等,这些习俗反映了对蚕桑丰收的祈祷,也是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的维系联结。无可争议的,农业民俗与农业文化遗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是遗产地居民的文化身份和标志。令人痛惜的是,人们对农业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的“觉醒”似乎非常滞后,直至物质富裕的新时代,在生活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人们方开始追求精神上的审美和享受,才开始关注农业文化遗产的精神文化价值。因此,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研究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关注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耦合联动机理,并在实践中建构遗产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

① 王思明、李明:《江苏文化遗产录(农业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89页。

② 丁方晓、曾德明、杨云辉:《全唐诗》,岳麓书社,1998年,卷892。

③ 丁方晓、曾德明、杨云辉:《全唐诗》,卷798。

④ [乾隆]《震泽县志》卷1《疆土》。

⑤ 吴灿、王梦琪:《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家》2020年第12期。

⑥ 赵立军、徐旺生、孙业红、闵庆文、何露:《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与建议》,《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2年第6期。

二、类型特征及价值厘析

长三角地区不仅拥有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群,更凭借长江下游发达的水系和丰饶的土地资源,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灿若星河的农耕文化。我国先民在与大自然协同进化的过程中用勤劳与智慧探索实践出顺天时、应地利的农业生产系统,为后世农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依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法,长江三角洲的规划范围包括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三省中的26个城市。

截至2021年底,我国共有6批138项农业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①。其中,长三角地区共入选27项,分别包括浙江省14项,江苏省8项,安徽省5项,上海暂时空缺。其中,浙江省3项,江苏省1项,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名录(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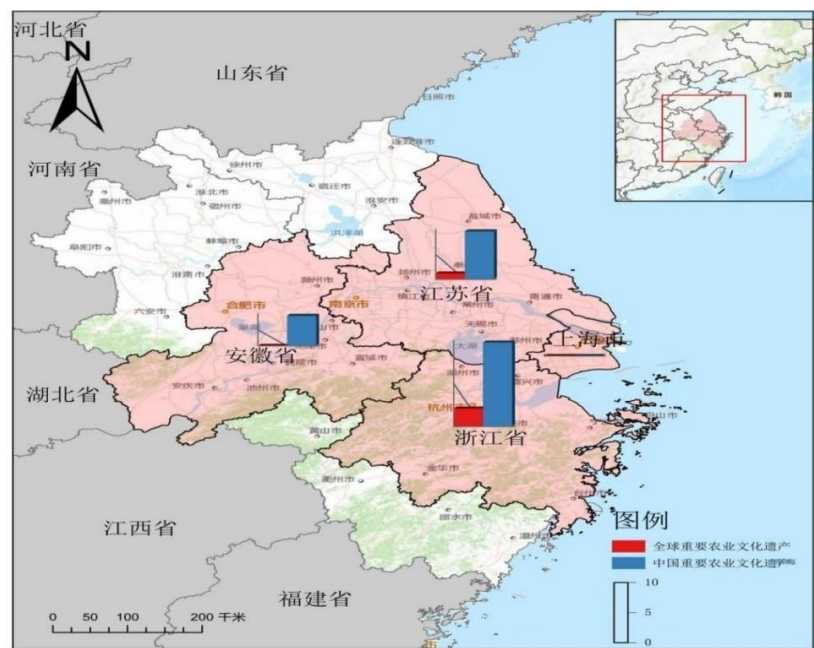


图1 长三角地区入选 GIAHS 和 China-NIAHS 名录数量图

为更好地开展研究,探析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在现实场域中的价值呈现,根据团队实际调查情况,本文将现有的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划分为湿地利用型、山地复合利用型、特殊物种资源型、技术体系利用型、传统水利系统型、循环农业型6种类型^①(见表1)。

表1 长三角地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类一览表	
主要类型	遗产名称
湿地利用型	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江苏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浙江开化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江苏启东沙地圩田农业系统
山地复合利用型	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浙江仙居杨梅栽培系统、浙江云和梯田农业系统、安徽太湖山地复合农业系统
特殊物种资源保护型	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江苏无锡阳山水蜜桃栽培系统、安徽铜陵白姜生产系统、安徽黄山太平猴魁茶文化系统、江苏吴中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江苏泰兴银杏栽培系统、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江苏宿豫丁嘴金针菜生产系统、浙江安吉竹文化系统、浙江桐乡蚕桑文化系统、江苏吴江蚕桑文化系统

^① 此划分由笔者团队调研,结合实情所得,未经权威认证,仅用于本文研究。

续表1

技术体系利用型	浙江宁波黄古林蔺草—水稻轮作系统、浙江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
传统水利系统型	安徽寿县芍陂(安丰塘)及灌区农业系统
循环农业型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浙江缙云茭白—麻鸭共生系统

这六种“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类型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优质的农业产品、丰富的生物资源、完善的知识技术体系,同时也由于长三角农业遗产受其地域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环境等影响,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服务地方整体发展。(见图2^①)

(一)湿地利用型定位及其价值分析

长三角地区处于长江入海口,汇集了我国面积最大的江、河、湖、海复合型湿地,沿海湿地又恰好位于全球最长的候鸟迁飞带上,在全国乃至全球湿地保护中都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笔者将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江苏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浙江开化山泉流水养鱼系统、江苏启东沙地圩田农业系统五类归为湿地利用型农业文化遗产。它们在我国湿地生态系统中独具一格,其总面积占全国湿地总量的10.1%,近海与海岸湿地和人工湿地的占比分别高达全国的37.4%和22.6%。同时由于湿地是自然界中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不仅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多种类的资源,而且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调节径流,改善水质,调节局部小气候等都具有显著作用^②。由此可见,长三角湿地利用型农业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与景观价值,不仅能保护自然生态、为农业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其本身就是天然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以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江苏高邮湖泊湿地农业系统为例,高邮湖位于江苏中部,属于里下河流域的一部分,全湖总面积约为780平方千米,蓄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高邮湖湿地为周边地区的工农业及生活用水、渔业生产、航运等提供支撑作用,同时由于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高邮湖湿地还具有稳定的资源调节和环境调节功能,在生态效益方面优势显著^③。此外,该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其独特的景观价值为当地生态旅游增加了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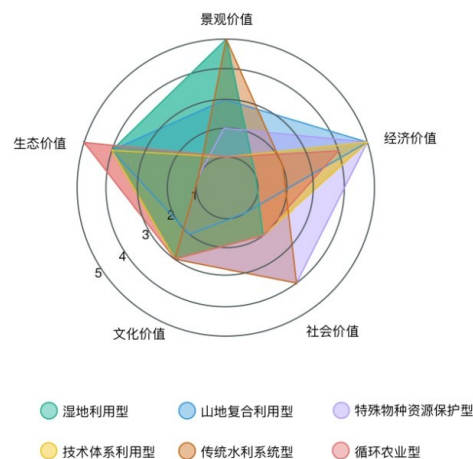


图2 长三角地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主要价值呈现

(二)山地复合利用型及其价值分析

山地复合生态系统自古代存在以来,已在不同地区形成相适应的类型。按照国际山地复合生态系统研究委员会给出的定义,农林复合生态系统是指在同一土地管理单元上,人为地把多年木本植物(如乔木、灌木、棕榈、竹类等)与其他栽培植物(如农作物、药用植物、经济植物以及真菌等)和(或)动物,在空间上或按一定时序安排在一起而进行管理的土地利用和技术系统的综合^④。

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浙江仙居杨梅栽培系统、浙江云和梯田农业系统、安徽太湖山地复合农

① 笔者对农业文化遗产在现实应用中呈现的价值进行排序整理,其中最为显著的价值体现赋分最高,其余价值阶梯式降低赋分,得到此图。

② 张人权等编著:《水文地质学基础(第六版)》,地质出版社,2011年,第1-184页。

③ 王敏、曹兆阳:《高邮湖湿地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探讨》,《江苏林业科技》2005年第1期。

④ 李文华、赖世登编著:《中国农林复合经营》,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业系统即属于山地复合型农业文化遗产。山地农业复合模式在丘陵山地农业生态建设中意义重大,其最显著的作用体现在促进山地各种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利用和保护。同时,山地农业复合模式可以增强农作物抗灾能力,减轻和防止山地农业生态灾难。土地与技术体系的综合利用有助于实现农产品无公害生产的标准化、集约化和规模化,并最终实现山地地区农业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良性协调发展。目前,长三角地区山地复合生态系统在生产实践中已取得较好的综合效益。例如浙江仙居杨梅栽培系统作为长三角地域山地复合利用型的代表系统,2015年被评选为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9年成功列入第二批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名单。浙江仙居杨梅栽培系统创造性地在不同高度的山地环境中,将古杨梅栽培与茶树栽培、土鸡饲养、土蜂饲养等产业有机结合,即在海拔700米以下、坡度30°以内的酸性基岩土壤地带栽培古杨梅,在杨梅林中间作混栽茶树,在林下生态饲养仙居鸡,在林中生态饲养土蜂的复合种养模式。这种农作方式不仅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多层次与立体化,更是中国传统“因地制宜”与“因物制宜”农业思想的高度体现,具体来说,既是遗产地乡民对当地特有小气候环境与不同物种之间适宜度的深度利用,也是对杨梅、茶、鸡、蜜蜂等四大物种之间生物特性的深刻理解。

(三)特殊物种资源保护型及其价值分析

文中划分的特殊物种资源保护型系统主要是以遗产地特有的物种资源为判定条件,即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其物种资源具有一定稀缺性,且知名度较高的系统则被划分为此种类型。按照遗产地各自特有的物种资源,长三角地区内的特殊物种资源保护型农业文化遗产包括: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江苏无锡阳山水蜜桃栽培系统等12个系统。事实上,在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农业生物多样性往往被认作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能为当地民众生计与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保障。江苏无锡阳山水蜜桃栽培系统充分借力、挖掘水蜜桃的经济价值,沿用传统的种植技术,以豆饼、螺蛳为肥料,对结果时期的桃子使用套袋,以防止病虫害,减少药物对产品及水、土的污染,这些技艺注重生态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同时注重现代科技投入,建立阳山水蜜桃的核心品种种植技术,使阳山水蜜桃汁甜如蜜、味甘可口,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真正惠及桃产业的发展。不仅如此,江苏无锡阳山水蜜桃栽培系统还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休闲观光,以清水莲碧、阳湖晚霞、文笔远眺等山水美景和百果采摘、竹海漫步、花岛观景、温泉度假、农家风情、佳绝桃品等休闲风情,吸引着消费者来到阳山体验休闲,使阳山水蜜桃品牌和阳山旅游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

(四)技术体系利用型及其价值分析

农业技术体系是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技术一般指农业劳动者在传统农业时期发明、运用并且传承至今的各种土地制度、耕种制度、种植养殖方法和渔业兽医技术及其附属活动。技术体系利用型农业文化遗产以农业生产技术为核心,并强调“活态性”的概念,即该系统至今仍在投入使用,对遗产地的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具有较强的支撑作用,并得以继续传承和发展,是具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活态农业系统^①。根据文献查阅与实地调研,本文将浙江宁波黄古林蔺草—水稻轮作系统和浙江黄岩蜜橘筑墩栽培系统归类为技术体系利用型农业文化遗产。

浙江宁波黄古林蔺草—水稻轮作系统中,其技术体系简单说来就是“一季蔺草,一季晚稻”的轮作模式:每年6月底至7月初,人们在收割后的蔺草田里播种晚稻;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晚稻成熟收割,开始新一季的蔺草种植,循环往复。由于土壤在种植蔺草后其质量得以改善,并与水稻种植所需的营养形成互补。一般来说,蔺草茬晚稻比常规连作晚稻亩产高出100公斤以上,且比常规单季稻风险少。蔺草与水稻的轮作模式,不但蕴含着自然农法思想和生态价值理念,更充分体现了古代古林农户的聪明才智与创造能力,是长三角地区技术体系利用型农业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

^① 龚小平:《安徽技术类农业文化遗产的类型及特征研究》,《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五)传统水利系统型及其价值分析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传统水利型的农业文化遗产主要以农田水利设施为支撑,后者泛指以灌溉排水为主的农田排灌设施系统,包括农田排灌设施、截流提水设施和水土保持设施等。农田水利设施一般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的水利设施,是农业基础设施的核心和农业发展的基石^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自古以来不断发展,极大程度地改善了我国各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使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对于我国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增产增收、农民经济收入增加等起到重大保障作用。安徽寿县芍陂(安丰塘)及灌区农业系统是长三角地区内唯一一项传统水利系统型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芍陂(安丰塘)相传于公元前6世纪由春秋时楚相孙叔敖主持修建,是中国留存至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以芍陂水利系统为核心,安徽寿县周边形成了包含区域水系、农业生态、田园景观、水神祭祀、灌溉管理等内涵丰富的灌溉性农业系统,这一系统对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建设和水利发展史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被誉为“中国活着的水利史”。芍陂水利系统支撑的区域农业发展已延续2600多年,至今仍旧可以在农田灌溉以及水产等方面贡献稳定的经济效益。

(六)循环农业型及其价值分析

循环农业是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并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经济增长模式。循环农业运用循环经济理论延伸产生农产品产业链,通过农业技术创新或组织方式优化,调整农业生态系统内部产业结构,构成农业系统物质能量的多级循环利用的新模式,使得农业生态系统能够最大程度利用农业生物质能资源,最大程度地减轻环境污染,最终实现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价值增值并达到生活环境优美的效果^②。

依据水网密布的特点,及其农业生产状况与社会发展关系,长三角地区形成了特有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和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为代表的两个系统不仅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而且先后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循环农业模式典范。以我国第一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据传,青田稻田养鱼始于唐、宋时期,距今已有超过1200年的历史。光绪年间的《青田县志》对此有所记载:“田鱼,有红、黑、驳数色,土人在稻田及圩池中养之。”^③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精髓在于充分利用农庄间的立体空间,在水稻田中养鱼。具体来说便是:稻谷在水面上生长,鱼在水下生长,两者互不干扰。一方面田鱼为水稻种植提供除草、除虫和翻松泥土的作用,同时鱼粪还可成为水稻的肥料;另一方面,水稻还为田鱼提供优质的食物来源和可靠的庇护场所,等水稻成熟之时,又可收获田鱼,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不仅延长产业链增加了收益,还可增加原本的稻谷产量,并成为长三角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三、传承与利用的现实意义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不同层次进行挖掘,往往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表征,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相当丰富。从个体的农业遗存文物到联系中的农业文化组合,从人文社会形态到与大自然和生态环境的紧密联系,从农民的物质生活到精神世界等^④。可以说,农业文化遗产与区域整体发展是共通和联结的。尤其在新的发展阶段,在农业社共生产方式、功能和价值都发生深刻转变的背景下,挖掘及利用好长三角地区的农业文化遗产更能助推乡村振兴、提升区域综合实力。

① 孔为廉、邢义田:《历史与传统——芍陂、孙叔敖和一个流传不息的叙事》,《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② 尹昌斌、周颖、刘利花:《我国循环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3年第1期。

③ 陈慕榕:《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7页。

④ 王红谊:《新农村建设要重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古今农业》2008年第2期。

(一)古为今用:助推农业生产的结构转换

当下,将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乡村发展路径的探索联系起来,方有意义。一方面,当代中国,伴随着农业生产模式、农业设施装备和经营管理模式的不断变革,农业生产效率激增,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也正在大幅度提高。正如前文提到的长三角地区特殊物种资源保护型农业文化遗产和技术体系利用型农业文化遗产,就是依托于地域自然禀赋与产业基础条件,挖掘其本身所蕴含的农业资源优势与农业生产技术优势,并转换为弥补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新动能,同时也为遗产地居民提供了农业就业机会,成为他们维持生计、提高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此外,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劳动生产的成果,是符合民众审美规律创造出的劳动作品,也反映出当地人民对美的理解和追求,因此其所蕴含的景观价值正成为长三角地区极富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并衍生经济效益和附加值,丰富了遗产地居民的收入来源,改变遗产的产业结构,加速产业融合,同时也满足了当代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耕种体验等休闲类服务的需求。换言之,在农业生产模式改革转型升级的特殊时期,挖掘利用好农业文化遗产可以“促进农业科技发展与农民意识升级,能更好地塑造现代化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生产促进乡村建设”^①。另一方面,随着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急剧扩张、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作为千百年来农民生产实践的智慧结晶,蕴含了生物种群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和农民对生态系统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三才三宜”“用水五术”等农业伦理思想的现实体现。正如孟子所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②尤其是在农药泛滥、化肥大量使用,过度追求农作物产量的今天,水土污染、生态失衡等生态问题频现,农业文化遗产所折射的深层次生态理念和智慧在当代的应用显得尤为迫切。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桑基鱼塘系统就是将传统农业生态思想充分发挥,并结合现代生产技术而形成的农业生态系统的典范,恰恰吻合当前绿色农业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令人痛惜的是,近现代以来,长三角地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的裹挟中,市场逻辑使传统“时宜、地宜、物宜”思想被均质的时间观所主导的消费需求取代^③,人居环境被破坏,彼时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价值才开始重回人们的视野。当前,长三角地区正通过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产品种类多样性、文化融合性和地方农业的发展可持续性^④,同时充分发挥其规避生态脆弱环节、抵御自然与生态风险、补救资源结构缺环等功能^⑤,彰显了“三才”“三宜”等丰富的中国农业伦理思想^⑥。

(二)精神重塑:唤醒遗产地居民文化认同

农业文化遗产广泛分布于乡村社会,其本身就是一种原生型民间文化,多样性、民间性和分散性为它的主要特征^⑦。事实上,农业文化遗产所内涵的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蓬勃发展的物质和文化基础,长三角地区历史悠久、地域特色鲜明,也镌刻着独特、丰富的农业文化基因。遗产地世代耕种的农民延续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延续着极具智慧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承着巧用自然规律的农业思想和农耕精神,承载着遗产地居民这一群体的过去记忆,这是属于这一特定人群共同体的表述、认同与传承,有很

① 卢勇、余加红:《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农业伦理挖掘与研究——以广西龙脊梯田为例》,《古今农业》2018年第4期。

② 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中华书局,2006年,第5页。

③ 徐业鑫:《文化失忆与重建:基于社会记忆视角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与保护传承》,《中国农史》2021年第2期。

④ 张灿强、沈贵银:《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价值及其产业融合发展途径探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⑤ 罗康隆、杨庭硕:《中国各民族农业遗产的特殊价值分析》,《资源科学》2011年第6期。

⑥ 卢勇、余加红:《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农业伦理挖掘与研究——以广西龙脊梯田为例》,《古今农业》2018年第4期。

⑦ 曹幸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新农村建设》,《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9期。

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其所包含的精神价值体系是民间社会的重要精神纽带和支柱^①。例如太湖种稻谚语、吴中养蚕习俗、通州童子戏、昆山水乡婚嫁习俗、甬直水乡妇女服饰等记录了遗产地居民的生活习俗、文化特色、审美意识,承载了遗产地的历史文化记忆。令人痛惜的是,在现代“物欲至上”的冲击下,人们精神世界出现“荒漠化”,众多地域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俗文化在地方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潮流中湮没,不少地区攀比之风盛行、乡风低俗,本质在于百姓基于地方认可的情感归属、信任和相互尊重感在现代工具理性的话语体系中正在逐渐消失,凝聚这一群体的精神纽带濒临断裂。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要复兴的前提是乡村文化的复苏,而其最重者在于农民的精神重建。”^②就此而言,我们挖掘、保护、利用好长三角地区的农业文化遗产从表面上来说是传承古老的生产生活经验、保存保护农业文化及地方民俗。更深层次地,是在留存和过去生活方式和文化状态的联系,是在重构遗产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并进一步转化为情感认识和认识自觉,形成良好的精神风貌,成为遗产地居民投入乡村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也应当是中国作为农耕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本^③。

(三)价值协调: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机制

近年来,乡村振兴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掀起研究和实践热潮。长三角地区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发达地区,整体发展水平较高,我们在讨论农业文化遗产现实意义这个话题时,更应当重点关注长三角地区。事实上,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农业现代化过程也面临着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调整 and 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第一产业的比重逐年下降,同时由于“功利性”的发展路径,部分农业产业链经营粗放,效益低下。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综合开发规模的增长和城镇工业化的扩张,农村地区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濒临极限,直接影响第一产业稳定增收、农民致富脱贫和生态环境优化,这是“三农”问题的症结,亦是乡村振兴战略企图逆转的乡村发展形势。长三角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依托于地域自然禀赋与产业基础条件在千年演变过程逐步形成了固有的优势禀赋,部分地方将现有的潜在优势具象为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从而产生了溢价效应和增值效应。例如部分长三角地区的农业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景观美学价值,地方政府便加大资源投入,开发乡村旅游产业,带动就业,为地方农民增加收入;还有部分农业文化遗产具有较为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生产技术,地方政府便加大技术、科研投入,聚力打造特色浓厚的农产品生产链条,甚至形成了成熟的农产品品牌,这为如何推进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实现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发展思路。但需要规避的一点误区是,乡村振兴绝不仅仅是产业振兴和经济振兴,绝不可把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窄化为经济生产,也不可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国家政策导向下的一种“驱动式”行为。事实上,经济、文化、生态的发展相辅相成、彼此促进,都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即是要发挥农业文化遗产本身所蕴含的农业资源优势、农业生产技术优势并转换为弥补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新动能;要激活文化、提振精神助推乡村文明;要运用好农业文化遗产所内涵的生态理念,净化绿水青山,进而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中实现乡村振兴。

四、传承与利用的路径选择

长三角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始终走在前列的区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举措、成效也可圈可点。但站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长三角地区的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如何做出更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当前,我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① 石奕龙、艾比布拉·卡德尔:《文化主体:遗产内在价值的最核心因素》,《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13日。

②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1-243页。

③ 孙庆忠:《农业文化的生态属性与乡土社会的文化格局》,《农业考古》,2009年第8期。

裕,已经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的靶向目标。这就要求我们要将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利用放到发展大势中去考虑。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兴起的遗产热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实现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如何真正保护和传承好底蕴深厚、各具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又如何借力农业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

(一)赓续血脉,坚持遗产地居民传承主体地位

202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开始正式施行,其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农民根本利益”^①。实际上是在强调,农民是农村的主体,谈乡村振兴不可脱离农民简单泛泛而谈。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也要牢牢把握住遗产地居民的主体地位。正如前文所述,农业文化遗产是当地人民千百年来耕种、劳作、生活时遗留的宝贵财富,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是农业文化遗产的创造者、葆有者和传承者,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是当地群众精神生活的粘合剂,我们在谈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利用这个话题时,必须充分尊重地方人民的意愿,不可固化思维,也不可“一意孤行”。最根本的是要破除思想偏见,坚决摒弃农村等于落后的思维观念,要充分保留好、保护好、传承好遗产地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将传统的农业生产技能和农业民俗文化原汁原味地传承下来,实现农业文化的活态传承,也就是依然发挥农业文化遗产的原初功能在发展中解决保护利用的问题。同时,要充分调动遗产地居民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构建“文化认同”,真正产生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利用的内在动力。

(二)政府主导,挖掘区域内农业文化遗产资源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评选工作在保护传承我国优秀农耕文化,促进农村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长三角地区有27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入选,浙江省数量居于第一,但值得关注与思考的是,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城市,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却为零,其间也可反映出当地在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挖掘和项目申报方面的一些问题。事实上,上海崇明岛拥有丰厚而优质的农业文化遗产要素,其中以崇明湿地生态系统最为典型,但该项目目前尚处于挖掘和申报环节,对其文化溯源工作推进缓慢。这也绝不仅仅是个例。长三角地区拥有众多优质、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许多甚至尚未被发现,湮没于民间。反观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浙江省通过加大财政投入,设立农业文化遗产专项保护基金,产学研协调发展支持农业系统保护,打造农业特色观光基地,实现从源头规划到农业文化传播的传承利用全链条设计,充分发挥主体责任,真正建立起有保障、有成效的系统化机制。因此,做好长三角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当务之急不仅要开展全面而深入的调查,在区域内持续深入开展识别评估工作,细致掌握区域农业文化遗产底数,做好整合汇总、梳理分类工作。与此同时,在申报环节要发挥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过去的申报工作大多由上级单位组织,地方被动申报。事实上,地方政府应当是最为清楚和了解地域情况的申报主体,相关机构应当积极引导,促发地方政府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觉醒”,发挥“主人翁”姿态,积极主动保护、传承地方农业文化遗产。

(三)彰显特色,注重农业文化遗产多样性传承

区域文化的多样性是地方百姓千百年以来的智慧结晶,同时也是促进地方农业文化遗产实现价值的重要“助推器”,各地政府可以充分借力地域优势打造独具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在浙江青田县,当地坚持保护特色、利用特色,探索出一条特色增值的有效路径,依托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打造“青田青”鱼米品牌,获得有机、绿色和无公害认证共14个;积极与科研院所开展合作,推出青田稻鱼米喜米套装、禅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1年4月30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4/30/content_5604050.htm。

米套装、伴手礼等10余款附加值产品;在侨乡农产品城设立“稻鱼共生”产品展示展销中心,开设青田“稻鱼米”微店和淘宝店;举办“稻鱼之恋”文化节,通过鱼灯表演、农事体验等活动,着力提升“稻鱼共生”旅游品牌知名度,真正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名片。据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一是挖掘并利用好地方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底蕴、自然景观价值等资源,在维护好产地生态多样性的基础上,推动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可以加快发展休闲旅游产业的开发,扩大遗产地的品牌影响力。二是充分利用各级博物馆,不仅可以保存、展示地方稀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可以博物馆为载体,以展览、教育、游客VR体验等方式向当地年轻人及外来的游客展示传统风貌,宣传地方文化^①。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保护传承机制,加强当地农户、企业同高校、研究所之间的联系,积极搭建长效合作平台,建立专业化水平高的研究团队,为遗产地的生产提供因地制宜的指导,将地方特色农业文化进行再加工和再深化,生产出符合时代、符合人民群众的农业文化产品。

(四)以文化人,构建内涵丰蕴的农业文化遗产

文化是民族之魂,要传承保护好农业文化遗产,必然要构建起适宜新时代的农业文化遗产传承模式,通过挖掘其所蕴含的农业历史、地方民俗,并加大力度宣传、开发,以增强地方群众对文化遗产的认同感并实现经济效益和文化价值的相互促进。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要进行前瞻性布局,以优质的农业文化为载体丰富精神文明建设,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各方共同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机制,鼓励企业、个人贡献力量,吸引培育地方传承人,真正实现文化延续。需要注意的是,推动农业文化遗产经济和文化价值的互促,是旨在促进经济发展与传承地方文化之间取得平衡,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低效发展经济,更不能因此而忽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否则会失去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后劲。要在继续挖掘潜在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同时,保护现有遗产地生态多样性,强化农业文化的传承价值,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下,充分挖掘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带所蕴含的活力,为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五)联而有形,打造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联盟

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区均处于长江下游附近,交通通达、文化交流频繁深入。因此在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长三角地区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区域整体性和共通性特征。通过对长三角地区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类型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区域内的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存在一定的相似度。如此来看,农业文化遗产带的打造可以借力成熟遗产地的区域带动作用。以湿地利用型的农业文化遗产为例,兴化垛田和高邮湖泊湿地同属于里下河流域,而里下河流域的河流分支还有很多,但是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与评选对遗产地的规模有一定要求,所以部分不达标的优质遗产就失去了参与评选的机会。如果将里下河流域视作一条农业文化遗产带,那么兴化垛田和高邮湖泊湿地则是区域内两个示范点,区域内其他湿地资源(如洪泽湖、溱湖、宝应湖、大纵湖等)可以依照两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成功范例对各自所在区域进行多维发展,扩大整条遗产带的影响力,以达到充分利用里下河流域的湿地生态资源,激发各农村区域的经济活力的效果,并形成农业文化遗产系统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除了里下河流域以外,同为湿地利用型的农业文化遗产的安徽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和浙江开化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同样具有形成农业文化遗产带的潜力,两项系统位置相近,特征相似,不仅可以带动周边区域相关产业的开发,还能形成一定的适度规模效益,减轻当地产能不够的局限性。对于特殊物种资源保护型的农业文化遗产,其地域分布上并没有明显的关联,但是在品种上存在一定的联系。比如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安徽黄山太平猴魁茶文化系统和江苏吴中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三项系统同为茶叶类型,可以形成茶叶生产专业合作社,总结茶叶生产的共性条件及各自经验,打造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联盟,既可以为区域内其他地区提供借鉴,又可以丰富相关地区的产业类型,进而以点带面地促进长三角经济进一步发展。

^① 唐志强:《博物馆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手段(英文)》,《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5年第1期。

结 语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当前,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作为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在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各地政府在文化遗产挖掘、申报、保护、利用方面拿出了办法,推出了举措,让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呈现在大众眼前,令人振奋欣喜。但对标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指向,尚有一定距离。长三角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因此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绝不是“拿来主义”和“形式主义”,究其根本,是地方百姓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发展形成的农业生产系统,是传承千百年来的智慧结晶,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价值。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实施的关键阶段,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价值利用之重要性日益凸显。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充分坚持遗产地居民的主体地位,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行稳致远,因地制宜,着眼大势,依托丰厚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加快推出特色鲜明、横向联动和文化底蕴深厚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举措,进而探索出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利用的“长三角样板”,为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徐定懿)

《中国农史》征稿启事

一、来稿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缜密,材料翔实,行文简洁流畅。论文应有简要文献综述,且章节清晰,标题设置恰当。篇幅一般在12000字左右。

二、文稿内容应包括:题名,作者及工作单位、所在省份及城市、邮政编码,中文摘要(200~300字),关键词(3~6个),英文文题,作者姓名(汉语拼音)及单位,英文摘要(内容与中文摘要一致),英文关键词(与中文一致),正文,参考文献。引文务必查对准确,注明出处,注释一律为页下注。注明论文所受基金资助。附作者简介,写明性别、出生年份、学历(位)、职称、工作单位、代表论著及主要研究方向。

三、稿件一般在三个月内予以答复。超过三个月未收到处理意见者,作者可自行处理。因经费和人手所限,敬请作者自留底稿。

四、本刊已启用采编系统,投稿请登陆:<http://zgns.paperonce.org/>。

五、编辑部邮箱(zgns@njau.edu.cn)主要用于交流,不接收投稿。

六、本刊不设通讯作者(或通信作者),不收取包括审稿费、版面费等任何费用,请广大作者知悉。

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卫岗1号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内

邮 编:210095

电 话:(025) 84396605